

论陶渊明的仕隐冲突

——兼及家世家风

张喜洋

(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广东湛江 524048)

摘要:不了解陶渊明的仕隐冲突就无法理解这个人。文章认为,仕隐冲突是陶渊明思想人格的突出表征。它在出仕过程中一直纠缠于陶渊明心头,隐居后也没有止息。但若从家世家风角度看,它在陶渊明出仕之前的心灵中已埋下伏线。文章还讨论了陶渊明出仕的主要动机以及离开仕途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陶渊明;仕隐;冲突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10)05-0098-04

仕即做官,隐即隐居。仕隐冲突,即在做官与隐居之间抉择。从自叙看,陶渊明(约365—427)在仕隐冲突中挣扎了几乎大半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先从家世和家庭谈起。

据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可知,陶渊明之种姓(即民族)是傒族,属于五溪南蛮一支。傒族在宗教上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信奉天师道。傒族和天师道这两个特点又衍生出了第三个特点,即对于儒家儒学的独特态度。所谓独特,在陈寅恪看来,就是凡此族并挟此信仰之人,对儒家儒学并无特别冲突而持一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认同也不反对(即“无赞同或反对之问题”^{[1]217})。

综合多种传记可知,陶渊明“曾祖侃,晋大司马”(沈约《宋书·隐逸传》)。祖父陶茂,为“武昌太守”(令狐德棻《晋书·隐逸传》)。父亲姓名官职呢?各传无载。据陶渊明《命子》可知,其祖父性格严肃,为人内直外方,名声著于朝廷内外,而恩惠远及千里。“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2]11}其父亲(姓名无考,但据北大已故教授王瑶先生推测也做过太守一类官职)性格恬淡止于虚无,做官无特别兴奋,不做官亦无特别恼怒。“于皇仁考,淡焉虚止;

寄迹风云,真兹温喜。”^{[2]11}母亲是孟嘉的第4位千金。孟嘉何许人?从渊明《孟府君传》可知,是征西大将军桓温之幕僚,其秉性“温雅平旷”,“冲默有远量”,“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翮然远寄,旁若无人”^{[2]129}。官虽不大,俨然一个有操守又坦率之人。有其父必有其女。在孟嘉影响下,其女(渊明之母)也肯定不是热衷势利之人。顺便说一下陶孟两家关系。从渊明自叙看,陶孟是世家姻亲。孟嘉之妻(渊明外祖母)是陶侃第10位千金,所以,渊明母亲不仅是陶侃的孙媳妇,还是其外孙女。搞清楚这种关系,对了解渊明思想人格之形成,不无意义。渊明祖父官阶不小,父亲外祖父也很有身份。为什么沈约《宋书·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乃至渊明自己竟然无记呢?我认为,原因可能有三:(1)在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谱系里,上品贵族是北方南下的那些郡望高的世家(如琅邪王氏、清河崔氏等),而不是陶侃这种被蔑视为“傒狗”(温峤语)的士族。(2)士族可凭能力被擢拔但出身并非炫耀对象。(3)渊明属隐逸者,故他人之相关传记及渊明自叙重点记述的当是其祖其父恬淡隐逸之出处,而不是其他。

如上家世和家庭对陶渊明思想人格之形成,至少有如下影响:首先,其曾祖、祖和父都做过太守以上官员,这多少会刺激少年渊明的出仕愿望。其次,傒族种姓和天师道信仰对儒家儒学的无可无不可态

收稿日期:2010-09-02

作者简介:张喜洋(1955—),女,陕西西安人,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文艺学和写作学研究。

度,多少也会影响渊明那朦胧的出仕动机,可能使他更多把谋生或建功立业以光宗耀祖的渴望而不是把“君父”利益放在首位。再次,其祖其父由个性带来的恬淡虚无家风,肯定也会对渊明产生影响,这会使他(A)即使出仕也不会把做官看得多么重要,(B)出仕过程中会时不时地冒出退隐想法。最后,由于其祖其父去世较早,渊明更多受母亲和外祖父熏染。母亲外祖父之为人和性格如前已知也都是温雅沉静洒脱之人,这多少也都会使渊明不把出仕看作最终目标而把适性率意视为个体人生之最大价值。

由上可见,在陶渊明出仕之前,其仕隐冲突已埋下伏线。

二

从自叙看,有三个因素多多少少都刺激过渊明的出仕欲望。其一是如前已知的乃曾祖乃祖乃父之楷模作用,其二是家贫,其三则是阅读儒书过程中被鼓荡起来的一种莫名的劲头儿。不管怎么说,青少年渊明一度曾为出仕做过准备。

乃曾祖乃祖乃父之楷模作用,是一种潜意识鞭策力量,如前已述,不赘。下面对渊明家贫和阅读儒书状况做一简单说明。先说家贫。陶渊明不是幸运儿。他出世时,家道已衰落。其《自祭文》说得很清楚:“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2]162}这不是矫情。《宋书·陶潜传》说它为“实录”。可能由于父亲早丧,所以其家益发“耕植不足以自给”^{[2]135}。因此,渊明虽出身士族但破落境况与上品贵族相比,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次言阅读儒书。由于乃曾祖乃祖乃父都曾是在籍官员,所以除将天师道作为一种信仰外,青少年渊明还不得不修读某些儒学经典以备出仕之用。从自叙可知,他早年与儒学有过密切接触。其《饮酒》(之十六)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2]67}前句描述不喜与人交接之性格,后句描述爱好“六经”状况。尽管如此,我们却无法在渊明爱好“六经”与出仕之间拉一条等号。因为,从其诗文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个例句来支撑这种看法。首先,青少年渊明确实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猛志”,但它与儒学无关。其《杂诗》(之五)云:“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2]55}这里提到了高翔远引的“猛志”,但渊明并未说它是由“六经”激发而来,反而说它是青年人“无乐自欣豫”情绪引发的。所谓“无乐自欣豫”如同辛弃疾“少年不知愁滋味”一样,是青春期中一种快乐天性。人一天到晚乐呵呵地,没办法。

既无缘由,也无踪影。《读山海经》(之十)云:“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2]103}这里也有“猛志”。然而,(1)它是渊明用来称赞刑天而不是用来自赞的。这如同看小说赞美某个人物。读者很难腆着脸说,既然我赞美了某个人物,所以我就是他。(2)《山海经》不是儒家“六经”。(3)刑天也不是忠君典范相反是一个反叛者。他被帝断首被迫以乳为目以脐为口并“舞干戚”,从儒学角度讲,是向帝的挑战,是不忠。其次,与其说渊明爱好“六经”还不如说他更爱好《论语》,与其说他关注“六经”还不如说更关注高风亮节之士的活动及远古与农事活动相关的天候问题。从所有诗文看,渊明使用《论语》典故比“六经”多得多。在《论语》中,不是孔丘忠君孝父之言论而是长沮桀溺之行为更受渊明推崇。其余如《劝农》中对《尚书》的零星引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桂林》(之二)对《周易》的零星引用,也都集中在农事活动和天候问题上而不是“君父”上。

由此可知,认为儒学“六经”鼓动了渊明出仕欲望之说,只是一种猜测,具有或然性而不具备必然性。但也不能说“六经”对青少年渊明未产生任何影响。从诗文看,渊明不但抒发过对“六经”不被重视的苦恼,也曾四处行游,做着出仕的梦。如《饮酒》(之二十)云:“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2]70}《拟古》(之八)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2]91}

由上可见,不管是受乃曾祖乃祖乃父出仕行为模塑也罢,不管是被家贫刺激并为了奉养母亲也罢,不管是由儒家“六经”暗中激发也罢,反正青少年渊明最初并未打算一辈子在“击壤自欢”、清静无为和穷困潦倒的隐居中度过一生。

他有出仕动机,也有出仕能力。一句话,他出仕了。

三

渊明出仕是失败的,而失败导致了隐居。

如前可知,刺激渊明出仕欲望的第一和第三因素是无形的和比较虚幻的,唯独第二(即家贫)不一样。它最为实在。毕竟,衣食住行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陈寅恪说渊明出仕动机主要是“禄仕”,我认为很有道理^{[1]217}。所谓“禄仕”,即为禄而仕。禄(钱财)是目的,仕是手段。必须指出,禄仕并不羞耻。魏晋南北朝,儒家道德仁义已彻底堕落为既得利益者用来愚民和杀伐篡夺的遮羞布,社会也混乱到了极点。一切篡乱者皆以道德仁义为号

召。不仅渊明,那个时代大部分人都明白所谓道德仁义是怎么回事。他们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心底透亮。对普通人来说,衣食住行才是硬道理。由于是禄仕,所以,渊明不在乎所仕者是谁,而以能获得“生生所资”之物并养家糊口为前提。从自叙看,他出仕时间断续约有十多年。《归田园居》(之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2]35}从职务看,他担任过江州祭酒,在桓玄自领荆、江二州刺史时做过幕僚,为镇军将军刘裕做过参军,也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做过参军,最后做了一段时间彭泽令。渊明出仕有两个特点:一是全由辟召举荐而非由君授(朝廷任命)。他做州祭酒也好,做幕僚(含参军)也好,做县令也好,全是由主其事者(如刺史、将军或家叔太常夔)辟召或举荐的。二是辟召和举荐者身份很复杂,尤其桓玄刘裕等,从儒家观念看,均为叛臣或僭主。渊明君父观念极淡,竟至于无,由此可见一斑。这印证了陈寅恪关于渊明家世的考据,印证了渊明自叙关于乃祖乃父“淡焉虚止”的说法,也戳破了南宋以来某些理学家的穿凿附会。

从踏上仕途的第一天,渊明就被仕隐冲突死死纠缠。从萧统《陶渊明传》可知,他任州祭酒很短时间(“少日”)就“自解归”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堪吏职”,想回家^{[2]35}。为桓玄做幕僚时,他写过《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及《杂诗四首》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既表达了行役之苦,更表达了回归田园的渴望。“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2]15}，“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2]16}，“遥遥从羈役,一心处两端”^{[2]17}，“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羈”^{[2]18}。这些句子中的仕隐冲突(既在仕途又想归隐)非常强烈。在为镇军和建威将军做参军时,他写过《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和《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等,表达了比前更急切的想法。“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2]32}这简直就是“刚离开家就想回家了”的一种文雅说法。“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2]32},又把自我肉体被仕宦所拘但隐居素志不可拘的心理活动袒露得一览无余。从《归去来兮辞并序》可知,在彭泽令任上,仕隐冲突也没有放过渊明。“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2]135}少日,是多少天呢?渊明解释说80几天。任县令仅80几天,就想回家。可见仕隐冲突多么严重!由此“少日”亦可知,当年任州祭酒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两个多月。

为什么人在仕途却不断想归隐?从自叙可知,

有以下几个原因:(1)恬淡本性使然。渊明性好读书(“诗书敦素好”),喜欢在静静园林独自徘徊享受一点儿脱俗之宁静(“园林无世情”)。他把这种想法叫作“真想”(“真想初在襟”),把这种生活叫作“养真”(“养真衡门下”)。渊明这种本性与黑暗官场和与他作为最低级官吏的日常生活有天壤之别。(2)解脱心被形役的苦恼。心被形役,即心灵被肉体所奴役。所谓“一形似有制”,所谓“形迹拘”,所谓“口腹自役”,所谓“既自以心为形役”等,都是渊明抒发苦恼的口头禅。他不想做大官(“不为好爵萦”),只想赚取一点儿温饱之资。但出仕却意味着自己拿起枷锁往身上套。(3)捍卫自我尊严。渊明出仕之最高职务是80几天县令。它是最小最卑贱的官儿,而幕僚仅是吏。在以儒家君臣父子理论为基础所建构的古代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体制(尤其九品中正制)中,身为士族的县令和幕僚身份是很悲惨的,他时刻都得付出自我尊严的代价。众所周知,渊明最终归隐的根本原因就与此相关——“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尽管“禄仕”也不能不要尊严,这是渊明与许多仅以禄仕为满足的人的根本区别之一。

由于如上原因,渊明人在仕途心在田园,仕隐冲突极其激烈,也从未止息。《杂诗八首》(之二)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2]54},《杂诗八首》(之五)又说“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2]55},都是由仕隐冲突所引发的感慨和灰心。当冲突到达极点以致难以解脱时,他不得不以“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2]135}为理由,自嘲般逃回了田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2]135}是自我庆幸的欢欣,但也是无可奈何的哀鸣。从《归去来兮辞》中,我们能找到他在仕隐之间犹豫的许多证据。他一方面对仕途做深刻反省——“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另一方面又心有不甘——“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2]135}表面的清醒“觉今是而昨非”,却难掩其内心深处的“惆怅”、“独悲”和“惶惶”。

四

退隐之后,渊明的仕隐冲突是否消失了呢?我认为,没有。

退隐之初生活好歹过得去时,渊明曾一度欢快一度沉寂。其明证就是《归田园居五首》。第一首他对“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2]35}的日子比较满意,曾深情慨叹:“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2]35}。第二首“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2]35},更能说明他已基本平静下来。一旦平静,他就打算实施《归去来辞》所规划的生活——从容地农耕、读书和饮酒。从自叙看,他退隐之初似乎真的品尝过精神与自然契合的乐趣。《读山海经》(之一)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迴故人车。”^{[2]99}看,多么舒适!《饮酒》(之五)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2]63}看,多么娴雅!他似乎真的步入了“欲辩已忘言”的仙境。

但实况并非如此。随着生活步入困境,仕隐冲突又时时浮现。

对渊明这种没有通过贪腐赚到钱的低级官吏来说,隐居并非“或命巾车,或棹孤舟”那般闲散,亦非“乐琴书以消忧”那般诗意。他必须亲自参加农耕。《归田园居五首》(之三)云“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2]36},就是他辛勤劳作的描述。《归田园居五首》(之二)说“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2]35},《移居》(之二)又说“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等^{[2]42},就是他与农夫密切接触的描述。《归田园居》(之二)“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2]35},则是与农夫闲聊庄稼长势的描述。与农夫单纯忧虑收成不同,渊明不时有仕隐冲突冒出。《拟古》(之九)云:“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2]92}有注家从儒家君臣观念出发说此诗是忠晋之作。大谬!其实是渊明仕隐冲突的表露。渊明认为,桑

树被摧折浮江面是由于离开了高敞平原,而自己遭贫穷受磨难则是由于离开了仕途。尽管他用“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表达了既已放弃又何必后悔的志气,但仕隐冲突之心理痕迹却栩栩如生。渊明时常被苦闷袭击,亦时常郁郁不乐。在《饮酒·序》中,他坦承“闲居寡欢”并悲叹“淹留遂无成”^{[2]61}。《杂诗八首》(之一)中,他又极度颓唐和极度幻灭,认为“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2]53}由仕隐冲突引发的忽悲忽乐情绪一直延续,直到《感士不遇赋》。赋云:“寓形百年而瞬间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2]156}可见他虽对自己“怒而隐”做了清算,但仕隐冲突仍未释怀。渊明后半生有时恬淡静穆,有时又激昂愤慨,都与仕隐冲突相关。

由于火灾蝗灾,渊明生活水准每况愈下。最可悲的是,宋元嘉3年,时已62岁的陶渊明由于旧谷罄尽新谷未熟,竟连续10天无饭吃而被迫乞食。渊明本来走不到这一步,因为,他毕竟与普通农夫不同,是可以重新出仕的。但渊明不可及处,也表现在这里。他告别仕途后多次陷入贫困多次有入仕之念也多次被劝入仕,却再没有踏入。从颜延之《陶徵士诔》可知,大概在晋义熙12年(417)左右,他已经下定了隐居至死的决心^{[3]1848}。“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宠非己荣,涅岂吾缁”(《自祭文》)等,就是渊明甘于清贫、永不再仕的肺腑之言。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M]. 金明馆丛稿初编. 北京:三联书店,2001.

[2] 王瑶. 陶渊明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 [刘宋]颜延之. 陶徵士诔[M]. 昭明文选:第6册.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TAO Yuanming's Official-Hermit Conflicts: Family Background and Tradition

ZHANG Xiyang

(Humanities School,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48,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It is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TAO Yuanming without knowing his conflict between being an official and being a hermit.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AO's conflict between being an official and a hermit was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AO's personality. It had been lingering in his mind until later when he retired.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xtra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hidden line of his conflict had already been buried before he became an official.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his motivation to be an official and the cause of retirement.

Key words: TAO Yuanming; official or hermit; conflict